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主持人 倪邦文[中央团校党委书记,教授]: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五四运动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它“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它“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本栏目第一篇文章,通过聚焦五四时期社团的分化,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革命浪潮中的选择、坚守以及分道扬镳,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和大浪淘沙中各种思想杂质的沉浮。本栏目第二篇文章围绕五四运动究竟改变了中国什么,对五四遗产与历史意义进行了再审视。从晚清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切入,可以看到新生政治力量的诞生,使得五四运动有着鲜明的爱国革命运动、社会革命运动、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因而使现代中国在指导思想、领导力量、道路选择上有了清晰的路径。本栏目组的这两篇文章,期望展现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五四运动,揭示其深刻历史意义以及对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所在。

选择与分化:五四时期社团兴衰及当代启示

■ 倪邦文 张治银

(中央团校;中央团校 科研部,北京 100089)

【摘要】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上产生了一大批社团。社团创办者们普遍意识到建立组织的必要性,突出社团宗旨,重视社团规约,注重培育团体意识,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社团发生了急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506.001

收稿日期:2021-01-20

作者简介:倪邦文,中央团校党委书记,教授,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委会主任,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共青团与青年工作;
张治银,中央团校科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研究”(课题编号:2019M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剧分化:一部分社团成员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一部分社团成员倒向资产阶级阵营。发生这种分化,根源在于社团成员在“主义”选择上的迥异——选择了不同的救国方式,选择了不同的依靠力量。五四时期的社团兴衰启示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树立团体意识,增进组织团结,到人民群众中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

【关键词】五四时期 社团 选择 分化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这一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批先行觉悟的青年创办了各种社团以服务民众,或训练与成就青年,以求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后因宗旨和道路选择不同,社团出现分化、趋于衰微。研究五四时期社团兴衰的经验教训,对当代青年组织和青年运动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一、五四时期的社团兴盛与组织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登记在册的北京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数量还有增加^[1]。五四时期的社团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可谓不兴盛。这一时期的社团尽管在宗旨和道路选择上差异很大,但从组织建设角度看具备以下共性。

普遍意识到建立组织的必要性。五四时期社团的兴盛不是青年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时势的产物。一方面,民族危机日益沉重。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入侵,试图变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清政府割地赔款,大量的负担被转移到了中国人民头上。在西方列强和封建统治者的双重盘剥之下,广大人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正如《共进》所描述的那样:“五四运动是外国帝国主义逼出来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后,“民众势力之散漫,及陕西连年军阀专横之特甚,便产生了共进社这样特别的组织”^[2]。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力量无法应对当时的危局,社会大众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恽代英曾说:“天下事决非一个人所能做成,利用群众亦不可望以一人手足掩天下耳目,所以基本的团体仍不可不用极真诚、极切实的态度去建设”^[3]。林育南也提道:“我们谈论的结果,总觉共同生活的团体为维持我们个人合理的生活和发展怀抱的唯一利器”^[4]。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危如累卵的切肤之痛,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开始建立各种社团。

突出社团宗旨。综观诸多社团,其宗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倾向于政治救国。如新民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强调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5]。二是倾向于学术救国。少年中国学会明确提出“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6]。尽管后来有修改,但强调以学术研究来救国的思路并未改变。三是倾向于以道德修养救国。互助社的宗旨为“群策群力自助助人”^[7],觉悟社的宗旨为“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8]。这类社团强调从道德修养角度实现人的改造,以达到救国目标。四是综合类。国民杂志社的宗旨为“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新知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9],该宗旨涵盖了道德修养、教育、学术和商业等多种救国渠道。诚如杨钟健评价少年中国学会时所说:“除了会章上所要求的宗旨以外,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分歧。只有要求改变现状,倒是一致的”^[10]。这句话用于评价五四时期的社团,同样适用。无论宗旨怎样表述,目标都只有一个——改变中国的现状。

重视社团规约。既然建立了组织,吸收什么样的人加入组织就显得尤为重要。五四时期

的社团对加入的人员均有相关的要求。一是明确了成员行为标准。新民学会的规矩为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11],互助社的戒约为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12]。二是明确加入组织程序。新民学会入会手续是“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13]。少年中国学会除有五人介绍和评议部认可的规定外,对于海外欲入会人员,也有明确办法,“凡甲会员欲介绍某乙入会时,须先介绍某乙与会中丙丁戊己四位会员通信。通信既久,察其言行果可以介绍入会,然后由甲丙丁戊己五位介绍入会”^[14]。三是规定了不合格成员处置办法。新民学会规定,如有不关注本会事务、对本会无感情、无向上之要求、缺乏团体生活兴趣、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等情形,不能再认其为会员^[15]。少年中国学会则规定了警告和除名的几种情形。会员易家钺在报纸上“辱骂女高师苏梅”“吐词淫秽,阅者无不骇怪”“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破产,于社会前途影响实大。舆论哗然。”学会召开临时会议,议决“请执行部把易君前自请出会函提交评议部追认”,评议部“全体赞同易君自请出会”^[16]。

注重培育团体意识。一是认识到培育团体意识的重要性。利群书社曾刊文说,要使团体成为“为社会服务的有力团体”,“最急的是求团体意识的形成”^[17]。个人身上总存在许多不利于团体发展的缺点,改正自身的缺点,培养团体意识,成为当务之急。二是开展集体生活。以新民学会为例,学会出版《会员通信集》,成“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18]。后期随着时势发展,新民学会又创办了文化书社、留俄勤工俭学团、俄罗斯研究会、湖南自修大学等组织。系列外围组织的创办、各种活动的开展,训练了会员,增进了会员的团体意识。三是开展相互批评。萧子升曾在给毛泽东的书信中介绍了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对彼此个性的批评:“(和森)坚强,防僻。(焜甫)须去寒士气。(赞周)分析力强,须防无条理。(子璋)活泼有孩气。(芝圃)严正,防简单。(和笙)精细。(荣熙)宽厚,而官能欠灵动。(子升)周到有条理,防狭隘。(警予)温良,防躁急。(季光)从容不迫。(叔彬)自信力强,欠灵动。(咸熙)颇强固。(玉山)温和,但有女性”^[19]。通过开展相互批评,有助于加强会员间的彼此了解,增进团体意识。

注重在青少年中开展活动。一是注重在青少年中发展会员。蔡和森提出,要造“幼龄之小学生”“广联高小、中学、专门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点”^[20]。二是组建了“青年学会”和“少年学会”。五四运动以后,赵世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生中发起成立“少年学会”,创办《少年》半月刊,讨论“独立生活和实行工读问题、学生参与校政问题、男女同校问题、妇女解放问题”^[21]。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的进步学生组建了“青年学会”,创办《青年》半月刊,刊物每期发行4000至5000份,远销十余个省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22]。三是明确以青年为服务对象。在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中提道:“本会既为青年活动团体,故出版书报,多系鼓吹青年之作。盖青年者,吾人所视为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也”^[23]。五四时期的社团资料表明,无论社团性质如何,他们都以争取青年为己任。

二、社团的分化及其原因

五四时期的社团是相当复杂的。起初,这些社团为反对内外敌人的压迫而创立,也曾五四运动中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社团发生了急剧的分化。这种分化突出表现为社团成员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一部分社团成员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

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24]。五四运动是怎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组织上的准备的呢?从党史研究看,早期的党史著作肯定了五四时期的社团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李立三曾说:“在这个时候,中国青年界上发生许多团体的组织,在全国不下十数,可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有几个:1.新青年社2.星期评论社3.新中国社4.觉悟社。在湖南就有新民学会,在湖北就有共存社;还有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前身”“文化团体的分化,就造成共产主义思想运动”^[25]。从事实看,五四时期的社团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如新民学会的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彭璜,互助社的恽代英、林育南,觉悟社的周恩来、马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邓中夏,少年学会的赵世炎。其中,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均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很多人还同时参加了好几个社团。这些社团的骨干人才后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与他们在社团组织中接受的锻炼、积累的经验息息相关。可以说,五四时期的一些社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一部分社团成员倒向资产阶级阵营。一方面,社团成员的复杂社会背景引起社团分裂。以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最明显的少年中国学会为例,学会从成立起就包含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结成的统一战线团体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很多人持国家主义立场。廖焕星回忆:“余家菊、陈启天带了两个自学同志到长沙”,到长沙后,“他们就完全暴露了国家主义派的丑恶面貌,与我们的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宗旨相背驰”^[26]。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会上“左舜生、陈启天、曾琦、余家菊等绝对主张国家主义”,大会产生了“改组委员会”,对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学会的态度进行调查,学会就此解体^[27]。另一方面,社团不切实际的宗旨导致社团破产。以平民教育社为例,该社主张“通过教育的革新和改良来改造社会”。改良主义思想找不到依靠力量,社团也就很快破产了,例如有的会员“幻想依靠资产阶级”,更有甚者“就干脆和反动政权同流合污了”^[28]。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29]。这些社团幻想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在现实中碰壁后,不得不解散破产,最终大部分成员倒向了资产阶级阵营。

“主义”选择上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社团的不同结局。“主义”是近代以来十分时髦的一个词语。西方传入中国的“主义”之庞杂,加剧了社团选择“主义”的困难。以社会主义为例,邓中夏将社会主义分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扎维克社会主义、门雪维克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其中马克思社会主义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30]。五四时期的社团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并都宣称自己掌握了改造社会的良方,但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改造中国社会。

“主义”不同,救国方式不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曾经在五四时期的社团中一度盛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张平均财富,一切平等”^[31]。但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32]。无政府主义者不懂得在没有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国家将一直存在,因而采取的措施就不切实际。1920年,王拱璧看到家乡的满目疮痍,仿照新村运动,在家乡河南西华县孝武营组建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素社”,实行村民自治,推行减租减息,创办青年公学,设立了小学部和农民补习班。1926年,“素社”遭遇土

匪溃兵袭击,由于没有武装力量保护,村中基本设施毁灭殆尽,“素社”宣告失败^[33]。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实践失败,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破产。

再如,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人格救国。在评价罗素提出不要暴力革命、要“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观点时,毛泽东指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34]。江西改造社的一位社员指出,振兴教育,拿不出“大宗的款子”,现有的学校都“保不住要关门”;文化救国,文化不能使“军阀不专横”“政客不捣乱”“列强不侵略”;工、商、农业等实业,无一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品抵抗”;人格救国,“率一群饥无食、寒无衣的人”,向“一群良心丧尽、血的温度在冰点以下的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谈人格,恐怕不免为他们所暗笑吧!”可见,“缓进派所谓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以至基督教徒所谓人格救国,都是空话,都不足以救目前的中国”^[35]。采行改良主义的方法,只能导致救国目标沦为空谈。

正是看到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蔡和森提出:“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36]。要实现社会的真正改造,就只有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就只能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从这层意义上看,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出路。

“主义”不同,还表现为依靠力量不同。毛泽东指出:衡量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 and 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37]。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五四时期的社团选择了什么“主义”,依然适用。以五四运动之初名气较大的新潮社为例,新潮社发起人傅斯年认为“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因此主张“(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38]。可见,只注重书本上的学问,将社团活动局限于书斋和坐而论道的小圈子,不去与群众实行真正的结合,是导致一些社团倒向资产阶级阵营,进而走向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间,共进社、学汇社均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但这种“到民间去”也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社团在城市里无法立足,不得不到生活成本较低的乡村去。宗之樾提出:“我们不象现在欧洲的社会党用武力暴动去同旧社会宣战,我们情愿让他们,逃到深山旷野的地方,另自安炉起灶,造个新社会,然后发大悲心,再去援救旧社会,使他们也享同等的幸福”^[39]。这种思想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不能真正实现和广大农民的结合。另一种是到工厂、到农村,与群众实行真正的结合。毛泽东指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者要多”^[40]。恽代英说:“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41]。正是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自筹经费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免费为工人子弟补习功课。“年轻的教员们抛掉大学的学业,来挤着住在这间小房里”,省下几块钱来“买茶叶糖果,好招待工人来学校里座谈”,而“他们这份儿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动了”,由此“谁也不再把教员们当成一般穿长褂儿的先生看待”,而“先生也不再讲客气,不再分彼此”^[42]。教员与工人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到劳动补习学校学习。由此可见,与人民群众的不同关系,造就了五四时期社团的不同结局。

三、对新时代青年和青年组织的启示

五四时期社团兴衰的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青年和青年组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青年组织如何带领青年建功立

业,迫切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指引中华民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新时代青年组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要做到:一是自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的学习。原著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学原著原文,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南。学原著,要力争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将之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三是要善于辨别是非,敢于与错误做斗争。毛泽东指出:“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43]。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注重培育青年的团体意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新时代青年要找准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加入什么样的组织、发挥什么作用。五四时期社团兴衰启示我们:一方面,人要在有限的一生中有所成就,必须加入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最具先进性的政党。新时代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才能建功立业,有所成就。另一方面,人的一生若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就是在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依靠人民群众来开展工作,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个人以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奋斗目标,既是在服务人民群众,也是在促进自我完善和进步。

注重增进组织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新时代青年组织要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领,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一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错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青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并帮助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44]。要努力避免将对错误的鄙视和嫌弃情绪迁移到组织和个人,影响组织的团结。要努力从团结和帮助的角度出发,耐心等待、启发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二是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升团体的组织凝聚力。团体的生命力在于组织凝聚力。组织凝聚力是以成员之间彼此理解和信任为基础的。青年组织要借鉴五四时期社团成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益经验,向组织成员介绍自我、批评自我,增进成员间的相互理解,扬长避短,形成组织合力。三是努力在实践中互帮互助增进组织团结。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带领广大青年开展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组织成员相互配合、互帮互助,加强彼此了解,这是加强组织团结的有效手段。

到人民群众中去。五四时期社团兴衰启示我们:只有真正走到人民群众中去,组织和个人才能得到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一是要主动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45]新时代青年组织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就得真正深入到青年和人民群众中去,在服务青年、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实现组织发展和个人成长。二是要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经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新时代青年和青年组织要

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党治国理政提供经验参考。三是要善于运用理论服务人民群众。青年和青年组织掌握理论后,要善于将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启发号召群众,用实际行动服务人民群众。四是要善于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青年和青年组织应坚定理想信念,投身服务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去。只有在实践中紧密联系群众,才可能真正培养自己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才可能将这种感情升华为坚定的理想信念。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 [2][21][22][28][35] 张允侯 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9、71、99、4-5、287-288页。
- [3][4][5][6][7][10][11][12][13][14][15][16][17][18][19][20][23][26][27][30][31][36][39][41] 张允侯 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0、177、6、224、118、558、9、119、20、238、11、241-242、132、10、43、14、220、205、505、390-391、102、39、306、397页。
- [8][9][38][42] 张允侯 殷叙彝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3、19、99-100、266页。
- [24][29][3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700、567页。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95页。
- [3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 [33] 朱美荣:《比较与鉴别: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1-32页。
- [34]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 [40]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 [43]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 [44][45]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责任编辑:韩永涛)